

当代中国学者随笔



# 思想的风景

朱正 随笔

东方出版中心

S I X I A N G D E F E N G J I N G

朱 正 著

笔

# 思想的风景

朱 正 随 笔



东方出版中心

---

## 说 明

经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批准，原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知识出版社（沪），自1996年1月1日起，更名为东方出版中心。

---

思想的风景——朱正随笔

朱 正 著

出版：东方出版中心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上海仙霞路335号 邮编200335）

印张：9.875

发行：东方出版中心

字数：220千字 插页5

经销：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版次：1997年1月 第1版第1次印刷

印刷：东方出版中心海峰印务公司

印数：1—10,000

---

ISBN 7-80627-139-2/I·57

定价：17.00元

---

# 目

## 录

序 .....	1
回头看袁世凯 .....	1
唐纵日记中所见的一次没有 实行的改革 .....	17
为什么有二十四——“帕金森 定律”的应用 .....	30
一百年前的思考——读《忘 山庐日记》 .....	35
关于孙宝瑄和他的日记 .....	52
秦桧的史学 .....	55
半个世纪 .....	62
增田涉谈鲁迅爱国主义 的特色 .....	67

鲁迅为什么要翻译《工人绥惠略夫》	71
“孺子”就是孺子——说《自嘲》	77
读《药》	84
夏二子与夏三虫	95
用心太过	99
介绍一封公开信	102
王锡荣作《鲁迅学发微》序	106
如见故我	110
谈《鲁迅全集》	115
保护法律	135
补白一丛	141
未可尽信	150
名教	153
张謇的另一面	156
严复教子	158
文章作法	161
从一个人看一段历史	167
几首咏叹西乡隆盛的诗	171
你比你感觉到的要能干得多——读格拉宁的 《奇特的一生》	176
陈独秀与《惨世界》	180
六十年的变迁	183
当今轶事我书成——谈李锐的毛泽东研究	187
庐山诗话	196
匹夫不可夺志——读《梁漱溟问答录》	199
读巴金《随想录》后的随想	202

谈吃	208
“好在……”	214
皮匠辨	217
论老婆的用处	219
论驴子的能量	222
搔痒	225
杂谈“成名”	228
名人与名文	232
我学写杂文	234
 《蔡元培全集》二题	236
所期待的与所得到的	243
哪一年的事——读《张西曼纪念文集》的一点质疑	247
不要求全	251
认真不得	253
 我学作文——记叶圣陶先生	261
回忆孙用同志	265
董每戡同志二三事	271
第一次去看望丁玲同志	279
只凭余事作诗人	283
绀弩的诗集《山呼》	292
编辑·学者·挚友——祝戴文葆同志七十大寿	296
萧老师	300
两副寿联	305

# 回头看袁世凯

清朝的重臣袁世凯要就任中华民国的大总统了。他问他的海军将军蔡廷幹：当他进入一个新时代之际，是否需要在外表上也表示一下，把头上的辫子剪掉。蔡廷幹说明了自己的意见，于是袁氏叫人拿来了一把大剪刀，对他说：这是你的主张，你来实行这个主张吧。“蔡将军用力一剪，就把袁世凯变成了一个现代人。”

这个故事是芮恩施在他的《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中说的。芮恩施是1913年至1919年的美国驻华公使。他在任期间，经历了袁世凯的帝制活动、日本提出二十一条、张勋复辟、巴黎和会、五四运动等等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他的这一本回忆录包含了不少可供人们思考那一段历史的有趣材料。

袁世凯剪辫子这件事，这里说的，似乎是很轻易就说服他同意了。据莫理循书信集《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中的材料看，事情并不很容易。1912年2月14日莫理循致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的

信中还说：“蔡刚才来看我谈关于我在今天下午5点钟去见袁世凯的事。他说袁世凯讨厌至极，他连辫子都不肯剪掉。”（上册第877页）两天之后，蔡终于说服了袁，16日他写信告诉莫理循说：“他们同意让我去剪掉总理（大总统）的辫子，而不是叫理发师，因为他感到相当难为情。”（第879页）

芮恩施的回忆录在写了“蔡将军用力一剪，就把袁世凯变成了一个现代人”这一句之后，接着写道：“但是袁世凯的内心并没有从此发生很大的变化。”头上没有了辫子的袁世凯依然是袁世凯。

袁世凯是个怎样的人，在他还是中华民国临时总统的时候，报人黄远庸评论说：“盖新旧竞化时一最有权力之政治家，而与新潮流殊其统系者也。”（《远生遗著》卷一第81页）“其思想终未蜕化，故终不能于旧势力外，发生一种独特的政治的生面也。”（同上，第1页）“斯人之与平民政治，终将扞格不容，虽无帝制之复兴，决无开明之建设。”（同上，第2页）这些话都说在袁氏表示其称帝意图之前，不能不佩服作者的眼力。

袁氏称帝，梁启超作《袁世凯之解剖》，也提出了类似的看法：“袁氏诚不失为一大人物，然只能谓之中世史暗黑时代东方式之怪魔的人物，而决非在十九二十世纪中有价值的人物。彼善能制造混浊腐败之空气，而自游泳于此种空气中，独擅绝技，譬诸瓮中醯鸡，彼以最能吸取酵质以自荣养故，故循适者生存优者获胜之公例，俨然称雄长于瓮中。然空气流转，清新之机一动，则其势决不能复图存，袁氏人物之价值实乃类是。”（《饮冰室文集》之三十四，第10页）

袁世凯有帝王思想，这是毫不足怪的事情。在帝制时代，看见过皇帝的权威而不艳羡的人大约少有吧。秦始皇游会稽，渡浙江，项羽同项梁去看热闹，看到那壮观的场面，项羽不觉心动，

说：“彼可取而代也”。仅仅因为那时犯上作乱谋反叛逆是要夷九族的滔天大罪，一般人才不敢轻试。在没有出现“取而代也”的可能之时，人们大都安分守己，相安无事。要到秦失其鹿那时候，项羽他们就会来逐鹿了。袁世凯看见过慈禧太后的气焰。当诸种历史条件把他推到这样的位置上，他有可能称帝了，他为什么不称帝呢？当然，也有不肯称帝称王的人，例如华盛顿，在独立战争胜利之际，他在答复一位劝他自立为君王的尼古拉上校的信中说：“自从作战以来，没有一件事令我这样受创的。我不得不表示深恶痛绝，斥之为大逆不道。”我们不能期望袁世凯也这样。他在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框架之内，一步一步由小吏爬到大臣的位置。他只理解这些，只熟悉这些。当一批不怕杀也杀不尽的乱党把一种共和政体强加给中国的时候，他毫无思想准备。因缘时会，他当上了共和国的总统，仍然觉得格格不入。一次他在接见芮恩施的时候，对这位来自一个共和国的使节说：“我们传统的习惯和你们西方的很不相同，我们的事情非常复杂。我们不能稳妥的运用你们的抽象的政策观念。”（前引书，第10页）

袁世凯的政治观点，据这位美国公使说：“他对于中国这时正在开始模仿的外国的各种制度只可能有一个淡薄的、模糊的观念。他对于共和政体的原则没有真正的认识和了解，对国会的职能和真实用处，尤其是对国会内的反对派的职能和用处，也同样没有真正的认识和了解。他只把这些当作必然有的恶事而接受下来，但认为其应用范围越小越好。”（同上，第13页）既然是不得已而接受的恶事，当然能够消除的时候就要消除，因此导致了取缔反对党、解散国会等等措施。袁在解散国会之后，另外成立了一个参政院，他所指定的参政，包括他的重臣周学熙、梁士诒、杨度，前清的大吏赵尔巽、李经羲、瞿鸿禨等人。芮恩施可能误以为这是一个国会性质的机构，他说：“他所宣布的重新组织

国会的意见中,有两个主要原则:第一,只有具有成熟经验和保守思想的人才可以当选为议员;第二,国会活动应限于对政府决定的政策进行讨论和提出建议。”(同上,第 52 页)实际上这个御用机构为袁世凯作了更多的事情,它自称代行立法院职权,决定成立一个国民代表大会,再由国民代表大会提出改国体为君主制!袁世凯能够容许的共和制,仅仅是有助于他成为一个君主的共和制。

莫理循 1911 年 11 月 17 日的一封信中,谈到了他对袁世凯的看法:“只要他活着就想当独裁者,不论政府是君主立宪制还是共和制的。”(前引书上册,第 790 页)列宁在 1913 年写的《中国各党派的斗争》一文中,称袁世凯为“愈来愈摆出一副独裁者架势的中国立宪民主党人”,并且说:“袁世凯的行径和立宪民主党人一模一样,昨天他是一个保皇派,今天革命民主派胜利了,他成了一个共和派,明天他又打算当复辟后的君主制国家的首脑,也就是打算出卖共和制。”(《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二十三卷,第 128 页,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应该说,他们都看得很准。这时,袁世凯已有君主之实,只是未居君主之名了。

谈到袁世凯帝制的准备,就不能不谈古德诺和筹安会。古德诺这人,在中国,人们总是把他和袁世凯联系在一起,名声是很不好的。例如陶菊隐的《袁世凯演义》就把他算“是袁用以推行帝制运动的开路先锋”,“袁授意叫他写了一篇《共和与君主论》,命法制局参事林步随译成中文,交《亚细亚报》发表。这是帝制运动公开化的第一声。”如此描写,他似乎是一个迎合袁世凯的政治需要帮忙造点舆论的外国旅游者。实际上不是这样,据《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的介绍,古德诺(1859~1939)是美国教育家和政治科学家,长期担任霍普金斯大学校长,“在其最有名的著作《政治与行政》中,他阐明公众意志如何通过行政表达出来;在行政

中，专门知识和等级制度发挥作用以实现公众意志。这本书影响美国公众事务的行政管理达半个世纪之久，对官僚制度的改革作出了贡献。”此人政治科学家的身份应该说是已有定论的了。这里一字不提他来过中国，担任过袁世凯政府的宪法顾问，在中国写过什么文章等等。大约在这《百科全书》的编者看来，这些在他的生平中只是不必一提的小事吧。所列举的他的著作中，有一本 1926 年出版的《中国：一种分析》，不知道其中是不是提到了他在中国的经历。

芮恩施的书是这样讲这件事的：“宪法顾问美国人弗兰克·古德诺博士于 7 月中旬回到北京作短暂停留，袁要他为总统准备一份备忘录，就共和政体和君主政体中哪一种形式更适合于中国国情作一比较。古德诺博士照办了。从一般的理论上讲，他认为，君主政体的形式可以被认为更适合于中国人的传统和他们实际的政治发展情况。他认为君主政体的一个特别优点是，根据这种制度，权力的继承是规定了的，因而不致一再成为争夺的目标。关于在当时从共和制真正回到君主制的利弊，古德诺博士有意不发表意见。”（第 135~136 页）

芮恩施此说不甚确切。古德诺文章中没有说的，只是通过何种形式从现行的共和制退回到君主制去，以及由谁来做皇帝的问题。至于在中国的具体情况下两种制度的利弊，倒是说得相当充分的。现在来看看他的这篇文章吧。在前面一大段论述君主制在权力继承问题上的优越性之后，他谈到中国的国情，包括中国人群的素质和政治传统等等。他说：“夫民智卑下之国，最难于建立共和。……勉强奉行，终无善果”，“第一，行共和制者，求其能于政权继承之问题有解决之善法，必其国广设学校，其人民沐浴于普通之教育，有以养成其高尚之智识，而又使之与闻国政，有政治之练习，而后乃可行之而无弊。第二，民智低下之国，其人

民平日未尝与知政事，绝无政治之智慧，则率行共和制，断无善果。”“中国数千年以来，狃于君主独裁之政治，学校阙如，大多数之人民智识不甚高尚，而政府之动作，彼辈绝不与闻，故无研究政治之能力。四年以前，由专制一变而为共和，此诚太促之举动，难望有良好之结果者也。向使满清非异族之君主，为人民所久欲推翻者，则当日最善之策，莫如保存君位，而渐引之于立宪政治。凡其时考察宪政大臣之所计画者，皆可次第举行，冀臻上理。”“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此殆无可疑者也。盖中国如欲保存独立，不得不用立宪政治，而从其国之历史习惯社会经济之状况，与夫列强之关系观之，则中国之立宪，以君主制行之为易，以共和制行之则较难也。”古德诺是以中国的“历史习惯社会经济之状况”作为出发点，得出了自己的结论。芮恩施说：“古德诺博士常常和我谈论中国的政治问题。他感到国会企图过多地采用西方政治上的做法，而没有充分考虑到是否对中国适用。他认为行政权不应该经常受国会的干涉，又认为中国实行内阁制的条件尚未成熟。因此他持一种相当保守的看法：赞成逐渐向西方制度的方向发展，而不赞成全盘采用西方制度。”(第 43 页)在一次宴会上，芮恩施听到古德诺更充分的发挥：“这里至今还是一个缺乏政治的社会，这种社会经过了许多世纪，它依靠自行实施的社会的和道德的约束，没有固定的法庭或正式的法令。现在它突然决定采用我们的选举、立法和我们比较抽象的和人为的西方制度中的其他成分。我倒相信如果制度改革能够更和缓些，如果代议制能以现存的社会集团和利益为基础，而不以普选的抽象观念为基础的话，那么情况就要好得多。根据实际经验，这些政治上的抽象原则，对于中国人来说，至今仍然没有意义。”(第 32 页)古德诺大约以为他只是以学者身份发表学术见解，和袁世凯的帝制活动没有什么牵连。张国淦的《洪宪遗闻》中也说：

“有人言古系受中国政府指使，似不尽然。”（见《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第140页）袁世凯如获至宝利用他的文章，却是必然的了。

芮恩施是既不很赞成古德诺的见解，也不很赞成古德诺发表文章。他说：“我认为，企图重建帝制是向后倒退。”而且，“由一个国家或一个国家的官员来断定哪一种政体最适合于另一个国家，那无论如何是不恰当的。”（第138页）

另外一篇重要文章是杨度的《君宪救国论》。主要论点，一个也是君主制可以避免权力继承时的争端，“元首有一定之人，则国内更无竞争之余地。国本既立，人心乃安。”另一个也是人群的素质问题，“人民程度不及法、美”，“中国程度何能言此。多数人民不知共和为何物，亦不知所谓法律以及自由、平等诸说为何义。骤与专制君主相离而入于共和，则以为此后无人能制我者，我但任意行之可也。”杨度究竟是中国人，对中国的国情比古德诺看到的要更多些。他已经看出：当时在中国实行的，只能是一种军事专政，政权的支柱是军队，只有军事领袖才有资格出任国家元首。《君宪救国论》对此说得清清楚楚：“乱世以兵为先。无论何种德望学识，一至彼时，均不足为资格，唯有兵权乃为资格。然使兵力仅足压迫议会之文士，而无统一全国军事之势力，则虽被选，仍无效也。”杨度的潜台词是：只有袁世凯具有能够统一全国的军事力量，此外无论何人，即令有办法让议会选他出来，也终归是无效的。这一条同人民程度低一样，是当时最大的一种国情。这也正是《君宪救国论》立论的出发点。

筹安会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耻辱的名词。自从周恩来在临终前不久公开了杨度的中国共产党党籍，人们对筹安会成员之一杨度的评价有了改变，认为他发起筹安会是探索救国道路中的一次失误。筹安会另一个列名为发起人的严复，也并不是一个

醉心利禄想当新朝佐命元勋的人。他的主张中国实行君主立宪，也是从他所见的中国国情出发的。武昌起义爆发还不到一个月，隆裕太后下诏宣布清室退位前三个多月，1911年11月7日，严复在写给莫理循的信中说：“直截了当地说，按目前状况，中国是不适宜于有一个像美利坚共和国那样完全不同的、新形式的政府的。中国人民的气质和环境将需要至少三十年的变异和同化，才能使他们适合于建立共和国。共和国曾被几个轻率的革命者如孙逸仙和其他人竭力倡导过，但为任何稍有常识的人所不取。因此，根据文明进化论的规律，最好的情况是建立一个比目前高一等的政府，即，保留帝制，但受适当的宪法约束。应尽量使这种结构比过去更灵活，使之能适应环境，发展进步。可以废黜摄政王；如果有利的话，可以迫使幼帝逊位，而遴选一个成年的皇室成员接替他的位置。”（前引书（上）第785页）可见在袁世凯当权之前，他就已经主张君主立宪了，后来列名发起筹安会，不过是他的这种意见的一个发展。

古德诺和筹安会的这些论点，是有他们的道理的。先说权力的继承问题吧。在熊向晖写的一篇文章里，记下了英国蒙哥马利元帅对他讲的一段话：“中国古代的帝王很聪明，在位的时候就确定了继承人，虽然有的不成功，但多数是成功的，这就可以保持稳定。以前英国常为争夺王位而打仗，后来平静了，因为有了王位继承法，也许是从中国学来的。现在许多国家的政治领袖不像中国古代帝王那样聪明，没有远见，没有足够的勇气和权威确定自己的继承人，这是不幸的。”据熊向晖说，毛泽东认为，“蒙哥马利讲的也有点道理”。（见《新中国外交风云》，世界知识出版社，第52、54页）

至于认为中国人民的素质在一段时期内还不能适应共和制，那么，不但古德诺、杨度和严复是这样看，袁世凯的最大敌人

孙中山也是这样看的。1912年8月30日《在北京湖广会馆学界欢迎会的演说》：“我国四万万同胞，智愚不一，不能人人有参政之智能。”（《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423页）所以他提出“训政时期”的主张，在实行宪政之前要对公民进行训练。1923年8月15日《在广州全国学生评议会的演说》：“若以大多数人解决问题，那只好从他们的希望实行复辟了。我们有时到乡下去，高年父老都向我们说：‘现在真命天子不出，中国决不能太平。’要是中国统计学发达，将真正民意综合起来分析一下，一定复辟的人占三万九千多万。我们果然要尊崇民意，三四十年前只好不提革命了。因为在那时，多数人要置我们乱臣贼子，是叛贼，人人可得而诛之的。”（同上书第八卷第114页）1923年12月30日《在广州对国民党员的演说》：“我们革命党推翻满清，把人民由奴隶的地位超度到了主人的地位；现在做了主人，不但不来感激，因为暂受目前的痛苦，反要来漫骂。常有人说：‘我们从前是很安乐的，自革命之后，国乱民穷，要有真命天子出世，或者清朝复辟才好，民国真是没有用呵！’”（同上书第八卷第574页）孙中山是觉得很委屈，他出生入死来革命，可是四万万同胞中的三万九千多万并不领情。这些盼望着真命天子的亿万黎民，就是袁世凯称帝的社会基础。这是一条大大的国情。袁世凯知道老百姓喜欢皇帝，期待皇帝，他当然敢于称帝了，俯顺舆情嘛。

袁世凯称帝有他的社会基础。中国国民党的创建者孙中山是这样看的。后来成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任领袖的陈独秀也是这样看的。1917年4月8日他在北京神州学会讲演，讲《旧思想与国体问题》，他说：“此时我们中国多数国民口里虽然是不反对共和，脑子里实在装满了帝制时代的旧思想，欧美社会国家的文明制度，连影儿也没有，所以口一张，手一伸，不知不觉都带君主专制臭味。不过胆儿小，不敢像筹安会的人，堂堂正正的说将出来。

其实心中见解，都是一样。袁世凯要做皇帝，也不是妄想；他实在见得多数民意相信帝制，不相信共和。就是反对帝制的人，大半是反对袁世凯做皇帝，不是真心从根本上反对帝制。”基于这样一种看法，陈独秀在这篇讲话中还悲观地说，“鄙人对于我国现在情形，总觉得共和国体，有无再经一次变动，却不能无疑。”（《新青年》第3卷第3号）好像是为他的话作注解，两个多月之后果然发生了张勋拥清废帝复辟的事件：又一次推翻共和政体的尝试。

陈独秀说的，当时反对帝制的人大半是反对袁世凯，这话不假。就说策动云南起义的重要人物梁启超，他在《袁世凯之解剖》一文中就说：“吾本以不信任袁氏故反对帝制”，“我国国体之宜于共和，抑宜于帝政，自是别一问题。然若如袁氏之弄此等阴谋以求为帝，实乃全国人所厌弃。”（《饮冰室文集》之三十四，第9、第7页）。

芮恩施还谈到他曾经到曲阜孔林游历，受到衍圣公的盛情接待。写到此处，这位美国外交官插进了一段颇有点令人惊奇的一段：“在反对清朝的革命时期中，一度有人认为衍圣公可能继承皇位。如果中国有一个汉人家族在政界很有声望，那么君主政权可能已经转移给汉人家族了，不过衍圣公绝对不是一个活动家或政客。周朝、宋朝、明朝和其他皇室的后裔也都没有足以引起全国人民注意的领导地位或才能。”（第39页）

请衍圣公出来当皇帝，这想法最早也许是梁启超提出来的。武昌起义爆发，各省响应，眼看清王朝气数已尽。梁启超写了一篇《新中国建设问题》，探讨中国未来的走向，他提出了采取单一国体还是联邦国体、虚君共和政体还是民主共和政体这些问题来讨论。谁来担任这虚君制的君主呢？梁启超以为，现在的皇统没有能够在一年多以前实行立宪，自己错过了历史给它的最后

机会，“然则舍现在皇统外，仍有行虚君共和制之道乎？曰：或有一焉。吾民族中有孔子之裔衍圣公者，举国世泽之延未有其比也。若不得已，而熏丹穴以求君，则将公爵加二级，即为皇帝。此视希腊那威等之迎立外国王子，其事为尤顺矣。夫既以为装饰品，等于崇拜偶像，则亦何人不可以尸此位者。此或亦无法中之一法耶。”（《饮冰室文集》之二十七，第46页）

袁世凯把这种说法当作一种笑谈记了下来，还利用这种说笑来为自己作掩饰。据《洪宪纪事诗三种》注文所引《后孙公园杂录》：“季直（按：张謇）被任农商总长，不到任。一日入京，与项城（按：即袁世凯）宴谈曰：大典成立，将举大总统为皇帝，尊意如何？项城曰：如以传统一系，又如罗马教皇制度为言，则中国皇帝应属孔子之后，衍圣公孔令贻最宜；否则孔混成旅长繁锦亦好。如以革命排满论，则中国皇帝应属大明朱家之后，内务总长朱启钤、直隶巡按使朱家宝、浙江都督朱瑞皆有作皇帝资格。季直曰：还有朱郎友芬、朱优素云也好。项城大笑不止。”（上海古籍出版社版，第289～290页）张謇完全明白袁是在同他寻开心，于是索性把玩笑开得更大点，把社会地位低贱到没有资格应科举的戏子也举出来。袁世凯除了“大笑不止”之外，也不好有另外的反应吧。

说要请明朝皇室复辟的话，张国淦也听袁世凯说过。他在《洪宪遗闻》中说：“帝制正嚣尘上，清室遗老如劳乃宣、刘廷琛、宋育仁、章梫等以为如恢复帝制，自应宣统复辟。劳乃宣首先发布《正续共和解》，宋育仁等又联合国史馆守旧派人员，有上书复辟之议。于是肃政使夏寿康呈请查禁，经批交内务部办理。某日政事堂会议，提出此项问题，项城言：‘宣统满族，业已让位，果要皇帝，自属汉族；清系自明取得，便当找姓朱的，最好是明洪武后人，如寻不着，朱总长（朱启钤时任交通总长）也可以做’等语，项